

評介陳翠蓮著《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

李泰翰^{**}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臺北：曹永和文化基金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二版。443頁。

一

陳翠蓮，現為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戰後臺灣政治史。作者自1980年代中期投入臺灣歷史研究，碩士論文以〈日據時期臺灣文化協會之研究——抗日陣營的結成與瓦解〉為題，博士論文以〈二二八事件研究〉為題，已出版《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時報，1995年）、《戰後臺灣人權史》（合著，臺灣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年）、《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合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年）、《臺灣全志政治志民意機關篇》（臺灣文獻館，2007年）等論著及20多篇論文，研究成果已獲學界重視。

近年來作者將研究焦點集中於日治中期至戰後初期臺灣人的認同課題，本書收錄的七篇論文乃是以2003至2007年之論著修改而成。由於各篇

^{*} 本文承蒙一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1年2月23日；通過刊登日期：2011年9月29日。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候選人

論文環繞著「國族認同」與「反殖民抵抗」的主題，作者將此書命名為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二

本書除導論外，共分 7 章。代結論〈曲折的國族主義〉附於導論內。

第二章〈自治主義的進路與侷限〉，探討 1921-1934 年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作者在若林正丈、周婉窈等前人研究基礎上，重新檢視、詮釋日治時期臺灣自治主義政治運動，探討林呈祿、蔡培火等人提出的自治主義路線論述，指出臺灣菁英雖複製、參引日本學者的論述，但展現出高度的自主性，正由於自治主義路線複製殖民者之論述，遵循殖民者之遊戲規則，導致日後有難以超越的困境。

第三章〈以文化做為抵抗戰場：《臺灣民報》中的臺灣文化論述〉，透過 1920-1927 年《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中關於臺灣文化之論述，探討臺灣文化協會分裂前知識分子對臺灣文化的想像與建議。作者指出臺灣文化運動者企圖直接取法西方文明，且希望透過自主的語文工具與近代文明接軌，但語文工具的選擇實涉及共同體想像與便利性等問題，無論是提倡漢字白話文、臺語羅馬字，在推行上都有相當困難。並論及文化抵抗運動受到殖民統治者阻撓的情形。

第四章〈菁英與群眾：文化協會、農民組合與臺灣農民運動〉，從「資源動員理論」觀點分析臺灣農民運動，討論菁英階層在農民運動中扮演的角色，尤其偏重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農民組合與農民運動的關係，進而檢驗日本殖民當局看法的真確性與資源動員理論在臺灣農民經驗中的適用性。

第五章〈想像與真實：臺灣人的祖國印象〉，以謝春木、黃旺成、吳濁流、鍾理和四人的遊記及文學作品為文本，觀察四人於 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的「祖國」之旅，作者認為四人均發現中國的落後，卻不約而同為祖國辯護，顯示其情感壓過理性，感性凌駕真實。因此，作者不認同部分學者認為戰後初期臺灣全島性反抗行動的主因是中國與臺灣的社會發展階段差異

或文化近代化程度不同而導致衝突，指出「文化衝突論」並非是理解戰後政治社會現象的適切觀點，不足以充分解釋戰後初期所發生的問題。

第六章〈戰爭、世代與認同：以林獻堂、吳新榮與葉盛吉為例〉，以不同世代三個人的日記作為分析文本，檢視戰爭體制下臺灣人的生活實況、進退選擇，以及國族認同變化情形。認為臺灣人在戰爭時期的政治認同並非固著，而呈現出游移、流動的現象，各有其因應局勢之道。戰爭使得殖民地不得不與殖民母國站在同一條船上，卻強化了本土認同。作者認為透過三人的觀察，顯示出不同世代間似乎出現了認同差別。

第七章〈「新生臺灣」的頓挫：延平學院創立始末〉，以留日臺灣菁英所組成的「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與延平學院的創立經過，探究兩團體被解散、關閉的原因。認為中國政府對臺灣菁英不能信任、充滿偏見，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與延平學院的遭遇可說是戰後初期臺灣菁英處境具體而微的縮影。

第八章〈戰後初期臺灣人的祖國體驗與認同轉變〉，作者認為日治中期以來，經過臺灣人反殖民運動長期的努力，已在政治與文化面確立鮮明的追求目標。在政治上，臺灣人共同體意識形成，反對殖民統治，追求以全島為範圍的臺灣人自治。在文化上，透過臺灣文化協會與《臺灣民報》的宣傳和論述，喚起臺灣人「作自己主人」的自覺，主張建立近代價值的文明社會。戰後殖民者離去後，臺灣人本以為努力追求的梦想得以實現，卻因二二八事件而幻滅，因而促成了臺灣人的覺醒。文中指出二二八事件並非突如其來的偶發意外，而是與日治以來反殖民抵抗經驗有著歷史的關聯性。

代結論〈曲折的國族主義〉，文中強調主要對話對象有三，分別是方孝謙、荊子馨、吳叡人。作者認為，若「方孝謙否認日治時期臺灣人已形成『我們是誰』的集體認同」，那麼「何以能夠在戰後初期極短的時間內驟然形成、迅速凝聚全島性的反抗意識？」（頁16）荊子馨明示或暗示「日本統治下臺灣人集體心靈已被改造『成為日本人』」，那麼為何日本戰敗時臺灣人不是與日人同悲，而是有許多人感到興奮激動，慶幸能夠脫離日本殖民壓迫？（頁17）又，「如果像吳叡人的樂觀看法，『這兩個先後出現的論述：臺灣人擁有自決權與國家主權的政治民族主義，與臺灣民族文化的文化民族主義，共同構成了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出現的現代臺灣民族主義的內容』，臺灣民族已然

形成。」那麼日本戰敗後，臺灣人為何不在這絕佳時機獨立建國，反而對中國政府的統治表示歡迎？（頁 17-18）進而提出本書主要論點：一、臺灣人在二二八事件時能迅速凝結全島性的反抗意識，實可將臺灣人共同體的形成上溯至日治中期 1920 年代。二、日本戰敗臺灣人不與日本人同悲反而歡迎「母國」，乃顯示日治時代臺灣人並未被改造「成為日本人」。三、日本戰敗時臺灣人之所以不獨立，乃在於「臺灣民族意識並未在此時已形成」。認為 1920 年代雖已形成明顯的臺灣人共同體想像，但直到日本統治結束，所謂的臺灣國族主義終究未能明確成形，反而歡迎同族大國的統治。直到戰後初期的抵抗中才覺悟非得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至此，臺灣國族主義方始形成。其形成過程曲折的原因，受到殖民者為自己塑造的形象影響，以及與臺灣人複雜的情感考量及利益取向有關。（頁 30-32）

三

綜觀本書，最大的特色為：由於作者長期關心臺灣這塊土地的歷史，努力透過研究為自己及他人解惑，因此本書所探討的主題均在臺灣史研究上具有其重要性。作者能嘗試透過各種不同資料的運用，從多元角度去探討臺灣人各種形態的反殖民抵抗行動；從不同面向觀察國族認同的問題，進而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論點，此可謂豐富且深化了此課題的探索。

然而，本書有幾點似值得再斟酌和商榷，茲略述如下：

首先，是有關於「臺灣人共同體」形成的問題。作者之所以重視「臺灣人共同體」的形成，並將其時間上溯至 1920 年代，主要目的應是為了證明日治時期臺灣人已經成形「我們是誰」的集體認同，並藉此說明二二八事件時臺灣人何以能在「極短時間內驟然形成、迅速凝聚全島性的反抗意識」。然而，作者似乎過於牽強的串起了這兩者間絕對必要的關連性。如果是為了解釋何以能形成全島性的反抗意識，日本統治後期因戰爭而強化臺灣人的集體認同，實應更值得被細緻化的探討，就這點而言，本書顯然並不夠充足。此外，作者認為 1920 年代已形成明確的「臺灣人共同體想像」，但是如何證

明這個共同體想像，不僅是部分知識菁英的集體共識，且是全臺灣人的集體共識，文中似未對此充分說明。作者從《臺灣日日新報》電子文獻資料庫，以關鍵字索引，指出「臺灣人」的稱呼在 1920 到 1930 年代最多，但據筆者實際檢索，這 538 筆所謂「臺灣人」關鍵字，其實能夠與「共同體想像」呼應者甚少。同時，作者表示「在臺日本人」以此名（臺灣人）來稱呼臺人，顯示「臺灣人」成為一個共同體的名稱，躍上歷史舞臺，那麼，該如何解釋作者在註釋中提到同一時期（1920-1931 年）同一個資料庫中用「本島人」的關鍵字可檢索出 4,080 筆的情形？

由此所延伸出來的問題是，作者與方孝謙的對話範圍。導論中清楚可見，作者藉由 1920 年代臺灣人是否已經形成「我們是誰」的集體認同來與方孝謙進行對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兩人的對話其實並不僅於此。翻閱方孝謙的論著曾清楚指出：「若林（正丈）的分析架構如實的被陳翠蓮（1999）所借用，但是她聚焦在 20 年代中期的研究上。她認為當時漢人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是出諸於中國結合，共抗日本的『二元對立』，而不是臺、日、中的『三角關係』，亦即他們欠缺以臺灣為主體的思考，這是因為他們『嚴重地向過去傾斜——耽溺在想像的、過去的中國；以致忽略了現在——忘卻臺灣已是不同於中國的社會；進而虛構了未來——臺灣復歸中國才能得到解救』。」¹ 就這點來看，本書作者顯然已經修正了這種觀點，並表示：「臺灣與日本之間並非單純的二元對立關係，而是更複雜的『西洋—日本—臺灣—中國』的多重關連。在政治上，不只是『日本—臺灣』間的壓迫/抵抗而已，而是『日本—臺灣—中國』三者間的拉鋸，……在文化上，也不是『日本—臺灣』的同化/抗拒關係而已，而是呈現『西洋—日本—臺灣』的三級位階，臺灣人希望直接取法西方，越過日本所媒介的二手文明，追求近代化而非日本化，展開出激進的文化改革傾向。」（頁 31）這亦正是本書主要的創見之所在。由此可見，兩者的對話範圍實不僅限於日治時期是否已經形成「我們是誰」的集體認同問題。

其次，作者認為自治主義者挪用殖民母國的論述雖是高明的策略，但是

¹ 方孝謙，《殖民地臺灣的認同摸索 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1 年），頁 80-81。

同一套論述也侷限了被殖民者的自我認知，指出臺灣菁英接受了殖民者替自己塑造的圖像，以為臺灣是「彈丸之地、微弱之民……」，在如此框架下，自然自我評價不高，極度缺乏自信，故自認為「落後無知」的臺灣人沒有能力要求殖民地完全自治，更不相信自己有能力獨立，而戰後仍寄望另一個大國主導。（頁 85）此一論斷雖有新意，亦有價值，但值得商榷之處在於：一、是否高估了日本殖民者的論述之影響力，而忽略了臺灣長期作為清帝國邊陲的歷史經驗。換言之，彈丸之地、小國寡民之自我觀感應非始於日治時期。二、不主張完全自治是否即等同於缺乏自信，此主張應是臺灣菁英鑑於韓國激烈抗日和主張完全自治之遭遇，以及審慎評估所處環境後之考量，平心而論，似不宜過於苛責他們當時沒有堅持主張完全自治或主張獨立的勇氣。三、若誠如作者所論，臺灣菁英吸收殖民母國之論述時，也接受了殖民者替自己塑造的圖像（第二章），那麼為何臺灣菁英又能在文化抵抗上，跨過殖民者劃定的框架，在「西方、日本、臺灣」的架構下，超越殖民母國，直接效法西方文明？（第三章）對此，似應有進一步補充說明之必要。

復次，是有關於延平學院的相關問題。略分數點論之：一、第七章作者對於警備總部表示：「延平學院辦理不善，且未奉准立案，『二·二八』事變中並有一部份員生參加叛亂，殊屬不法，應予封閉」的三點理由均不認同。認為第一個理由顯然不成立，第二個理由也過於勉強，所以針對第三點進行深入分析。作者運用了保密局檔案資料進而提出新的論點，頗有助於解釋延平學院被封閉的原因。然而，警備總部所提出的前兩點理由，辦理不善所指為何，雖無從得知；但該校未奉准立案，則乃為實情，因此，似無必要排除此理由的可能性。二、作者援引朱昭陽先生的回憶錄提到，延平學院建校當時開南為「陳有諒任校長」應有誤（頁 297）。據該校刊物顯示，當時應是由周延壽兼任校長，而到「三十七年二月九日周校長延壽因多兼公職無法專長本校，自動辭職，即由董事會聘校友陳有諒繼任校長」，² 提供給作者略作參考。三、延平學院在辦校之初經費並不充裕，也沒有自己的教室，而是與「開南商工學校約定，由延平負責修繕開南教室，開南提供晚間教室給延

² 《開南商工四十週年校慶特刊》（臺北：臺北市私立開南商工職業學校，1958 年），校史沿革。另可見，「開南商工校史」網路版第四章「光復前後多難的開南」之相關論述，網址：<http://web1.knvs.tp.edu.tw/web/%E6%A0%A1%E5%8F%B2.html>。

平使用。」³ 要言之，開南與延平兩校的關係實甚為密切，作者日後如欲進一步探討延平學院的相關課題，開南的校史、相關人士的回憶、訪談，對作者的研究應會有所助益。

最後，本書雖名為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但事實上，各篇論文多環繞著「反殖民抵抗」與「國族認同」的主題。顯然地，書名所涵蓋的範圍實較本書探討的主題更為寬廣，對此一時期的臺灣人而言，認同應不僅是「國族認同」，抵抗也不單只是「反殖民抵抗」。換言之，對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的研究，仍有繼續研究的價值與空間，期待作者日後更精闢的研究成果。

³ 朱昭陽口述、吳君瑩記錄、林忠勝撰述，〈朱昭陽關於延平學院的回憶〉，收錄於《不滅的暗夜螢光——承先啟後六十年的延平學院奮鬥史》（臺北：財團法人延平昭陽文教基金會，2006年），頁64。

